

社科奖什么的,如果没有这个,就好像缺了多少分一样,反正就是需要这么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评奖,有一次,我参加教育部和人事部的一个会议,关于评一级教授这么一个座谈会,北师大的一个教授提出来,我们这里评资深教授,一定是要拿全国的特等奖,才能评资深教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什么都需要这个奖,什么都需要社科基金这样的项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张教授这本书就写不出来。他等了17年,如果我等17年才评个东西的话,那干吗?所以说,真正做学问,不是为了什么名利,不是为了什么奖,而是真正为了求道。从这点来说,这对我们、对我来说也有很大的启发。当然,我在写《和合学》的时候,也没有人给我奖,写出来还有人对我不同意。批评没有关系,批评是好事,因为批评等于宣传你的观点,批评的话,就得看我的书。当然,也有不看我的书就批评我的。但是这也是好事。为什么?批评别人引起注意,你就要看看为什么受批评。所以,我说批评是好事,应该欢迎批评。真的要做到思想的完美,就是要让人家批评。这个批评不是盖帽子的批评。批评我的时候很多是盖帽子的批评。真正的学术批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批评的话,我们学者就不可能进步,就不可能有新的创造。

还有一个是美通。谭嗣同曾提出四通,即上下通、内外通、人我通、中外通。我觉得张教授的这本书是古今通。“通古今之变”这句话是司马迁说的。只有你能够通古今之变,通中外之学,才能做到美;如果不通的话,就不可能达到美的境界。从这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这部书是做得很好的。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提出来的,之所以通,他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要走我的路。也就是说,我要有我的品牌。这一点,我非常佩服。做人文社会科学,如果没有这个观点的话,就是永远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要自立门户,尽管是无宗无派,但是我要讲我的话。所以我提出来,我不是这个讲,也不是那个讲,我是自己讲,讲自己。所以我出了一本书叫《“自己讲”、“讲自己”》。只有自己讲自己的话,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社会科学才能够有创新,才能够有进步。我非常佩服张教授这一点,就是说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创立自己的门户。这样一种雄心壮志,这样一种思想境界,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的。我就讲这么一点,谢谢!

## 一部在书架上可以放很长时间的书

刘海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谢谢邀请我参加今天的研讨会!11月上旬我刚从欧洲回来,接到世明同志的电话,说是让我参加这个会议。这让我非常高兴,也使我非常担心、困惑,高兴的是这个会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感觉有些担心和困惑呢,是我对清史,老实说是一窍不通。我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法制史,这之前是在本科学习法律,但是我对清史没有接触。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参加云秦简整理的时候,和咱们国家老一代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一段工作中,他们对我国的通史、专史和断代史有一定的评论,其中在评论清史的时候,觉得它资料太多。在清王朝结束之后,对清史大量的资料没有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这种情况下,贸然进入清史资料的烟海之中,很可能看到一斑而看不到全豹,如果不小心的话,花了很长时间甚至一个人半辈子的时间,得出的结论,不是那么科学甚至是错误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部电影叫做《甲午风云》。《甲午风云》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刘步蟾,这个人从日本的档案和咱们国家的历史档案中最后证明,是一个爱国将领,但是在《甲午海战》中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派、投降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他的例子有没有?譬如说对李鸿章的评价,对曾国藩的评价,对张之洞的评价。究竟该怎样历史地看待这些人物,我觉得这是个问题。而我们当时认为好像是正确的评价,实际上它的科学性究竟有多少?另外,对慈禧太后这个人物的评价,历史上怎么样?当中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对戊戌变法后她所主持制定的十年新政,而十年新政在咱们国家法制建设中的影响究竟怎么看,问题非常复杂,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仍然是个困难问题。困难的一个方面是资料,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对这些资料怎样作出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来参会是一个学习机会,想听听各位清史专家的意见。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我搞了先秦和秦汉的一些专题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开始搞法治和人权理论,当时真是工作需要。我是学法律的,而国家当时学法律的人很少,并且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时候,全国仅有的少数学法律的人,大部分由于政治的原因都到其他方面去了,结果“文化大革命”之后,我

们的党和国家核心机构、宣传机构和司法机构都要人,需要你,你不能不去。我记得和李学勤同志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曾说像我们这样一些人,尤其是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人,不能说你学习什么就研究什么,而是说交给你什么任务你就必须去研究什么。80年代末90年代担任所领导以后,就离开了法制史研究,去搞法治和人权研究去了。我出差到欧洲就是这一任务。这使我对历史尤其是清史非常隔膜,所以说我觉得参加这个会,是一个学习机会。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对这部书的看法。因为我刚回来,并且回来之后还有一些紧急材料的整理工作,完了之后才看看书。世明同志说刘老师你翻一翻吧。其实为了参加这个会,我还是把《导论》部分看了,并且翻了法律部分,也翻了民族部分,其他两个部分就是简单地翻了一翻。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为世明同志捏一把汗,因为我一看篇幅这么大,如果是按照一般的清史著作,268年的清史,平铺直叙地写下来,究竟里头有多少东西是新的、确切的?当我翻了法律部分以后,一看它是属于专题,心就放下了。这个专题研究分为几点,而司法当中又是讲狱政和领事裁判权,实际上也是专题。刚才世明同志讲了他整个书的构思。按照我所理解,世明同志这部书很可能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累积起来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判断的这样。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形成一部鸿篇巨制,这个鸿篇巨制有这样一个优点,这个优点就是立足于专题,不至于出现我刚才的那种担心。这就更能够集中材料阐明观点,但是这里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前面的总标题上冠以司法,而这样人家一看,很可能以为这部书就是要讲清代的司法制度,实际上它里头讲的是司法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远不是司法制度。专题选择了很好的切入点,它使我放心了,但这一册的书名不很确切。

另外我想谈谈对这部书翻阅之后的几点感想。

第一点,在当前我们国家学界比较浮躁的情况下,世明同志能够以17年的时间坐冷板凳,形成这一部书,本身就值得我学习。我没有办法,这里头有我的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我不能不服从工作需要,主观原因是由于多种头绪的拉扯,使我不能够认真地坐下来去读书,而世明同志能够在这样一个领域以17年的时间独立完成这样一部著作,很了不起。几年前我曾经接受一个任务,是国家图书馆委托的,我不知道在座的一些同志还有没

有承担这样一个任务。国家图书馆要保留一部分学术著作,这一部分著作要存在国家图书馆,但是这方面著作现在太泛,需要挑选,结果他给我的书目是八千本,任务是要删掉六千本,保留两千本,占四分之一。我打开著作目录一看,就看书的标题、作者和出版社,看到我们学术界,包括我在内的浮躁情况。说老实话,我有时也没有办法。前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开头就是“人生在世不能不说套话,担任公职还要学习说一些官话,但是要做成几件事一定要说真话”。但是,我们这样的学术氛围,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我也多次参加过学术成果评选,送到那里的都是挑出来的,挑出来的著作必须按照那规范走,规范本身有时就把人给框着了。世明同志讲到一个问题,制度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是人要发展,必要时就必须改变这个制度。我们的一些规范,究竟多少有利于我们学术发展,这个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我们国家学者很多,现在学术界思想解放要比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环境要好得多,但是现在大量的精力浪费掉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浪费掉了。而世明同志这部著作,尽管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它在这一方面是超脱的,很有特色,很有特点,是在书架上可以放很长时间的。所以就这一点讲,很值得我学习。这是我对著作谈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就是这部书,大家可以打开看一看,涉及的文献,涉及的古今中外学者,涉及的各个方面的理论是相当多的。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可以说是旁征博引,治学的规范上非常严谨。其中有一点,他引证的不仅仅是大家,古今中外的大家,而且引证同代人、同辈的著作,这一点我非常欣赏。我们现在有一些作者,包括一些评为一级二级著作的作者,在引用的时候都引用的是一些大家,为什么我们现代一些年轻人的思想,好的东西进入不到著作中去呢?世明同志是学习了郭老的精神。郭老是大家,在历史、考古、文学各个方面都是大家,但是他在引证文章的时候,绝对不是只引证前人的、大家的、后人的、一般学生的,他只要认为好,就引用。我觉得世明同志在这里虽然引用了许许多多大家,古今中外的学者,但是也引用了同代人的著作,非常值得学习,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品格。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这个论著是史论结合,不是纯粹一部历史著作,也不是一部完全的理论著作,它是史论结合。它在著作过程当中,尤其是民族部分,大量用了

比较研究,立足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也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这使得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增加了视角,开阔了视野。另外是世明同志自己谈到的,他在科学地对待历史事件的时候,他内心想到了现在,就是在可以联系实际的时候联系实际。说老实话,在这个方面我过去是害怕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研究生论文的一部分。文章是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送出的,那时我已毕业,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历史教学》上发表。文章的原稿谈到隋末的农民战争对唐初几个皇帝的影 响,我引用了当时史学界的一种理论,叫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那时《光明日报》发表《历史教学》目录后,我在乡下搞“四清”,把我吓一跳。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我说我的这个观点当时要是发表出来了,就倒了霉啦。后来我一看,编辑给删了,这样免了一场灾难。而世明同志他赶上了好的时代,我在读到他联系实际的时候,他说到要重视GDP,重视经济发展,也谈到了制度建设,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十八大刚刚结束,十八大的宣传谈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翻两番,宣传得非常突出,这点非常好,翻两番非常值得我们庆幸,我们非常自豪。但是同时我们的新闻媒体,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无论如何要去认真地领会。翻两番要是没有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精神文明、思想道德的提高,我们的这个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不成。坦率地讲,如果不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就是翻了两番,我们的小康社会,究竟是什么样?起码它不是全面的小康社会。我觉得这一点能够联系实际,给人以启发。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这部著作是一部很好的著作,很有特点的著作,也赶上了好时代。这个著作在发表、制作的过程,是在我们国家清史资料整理、研究启动的过程中。清史研究对资料的整理概括,对人物、对事件,我没有接触,但我相信它会逐步在我们的媒体,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出来;而新揭示出来的资料、新的研究成果,对将来这部书再版,如果把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会使这部书更扎实。因为这本书在总的方面对过去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一些具体问题他有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究竟在学术界将来是否会引起争论?刚才讲了,这些争论是好事,就是希望能把其中好的东西吸收进去。譬如说这里头一些概念需要进一步推敲,我举个例子,这里头对“资源”的理解,世明同志并没有给一个很确切的结论,他是

作了几点说明,我记得是四点说明,而这四点说明怎么能被读者接受,作者的心意,包括刚才介绍的体系,作者的想法和读者在读了这部书后的理解,怎么能够吻合起来,这个还需要一个过程。针对“资源”问题,我看在戴逸同志的“前言”当中,他把“资源”理解成经济,直接理解成经济,这就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概括的时候没有给出十分明晰、十分确定的概念,所以戴先生就直接这样理解了。此外,在行文上如何更明快些,也是要认真思考和改进的。我希望在清史研究过程中,将新的材料补充进去,将新的观点吸收进来,将现在有不周全的地方能够完善起来。总的来讲,世明同志的治学态度、人品都值得我学习,我的看法可能有许多错误的地方,请包涵,谢谢!

## 独立思维权不可放弃

刘文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世明同志这个出版计划,我是早已知道了,但是看到这么一个大部头的书出版,我是感到非常震惊的。17年时间啊,我不敢说别人,但我是很难完成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利用自己前半生的这个时间,呕心沥血,是他拼尽自己的生命所写的。这点我确实感到非常敬佩。这部书我还来不及细看,大致翻了第一卷。我觉得一部这样的大部头的著作,肯定有各方面的议论,有待时间和实践去考验。世明同志的治学的精神确实是我非常敬佩的,他几乎是玩命的,所以我在给我们的博士生讲课时经常拿世明同志做例子,我说他在学术研究上是拼命三郎。我说你有时候不能不计较自己的健康。有时候他瘦了我真是害怕,胖了我还是比较高兴的。不管怎么说,这部书的问世确实是我们史学界包括我们法学界都应该感到兴奋的一件大事。广东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样大部头的著作,说实在的,一般出版社是不干的,我觉得这真是给我们史学界和法学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世明同志在史学方面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造诣的基础上,后来转攻经济法的博士学位,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转向,更不是转业。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研究领域里面可以看到,已经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民族各个方面,这里面已经和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在经济法方面进行学习,实际